

试论《狱中书简》中的神学思想

On the Theology of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宇汝松 南京大学

Yu Rusong Nanjing University

[英文提要]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is the last whoop to the world left by Bonhoeffer in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it became a beacon light to and stood in the history witness of the theology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will also open out its great value in this new century.

Bonhoeffer always kept a warm heart noting his everyday life, feelings and thinking detailedly in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when he was still locked up in the cold cell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book consists of some pieces of letters and papers which are written under a very hard conditions, so it is difficult to form a precise theology system. But it was these fragmentary thought lights that made of the theory elements of those postwar jacobinical “Unreligious Christianity” and “God is dead”, and that lit up the volcanic blaze of the 20th century’s worldly divinity, and that activized people to discuss deeply and widely the thoughts that God has been dead and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listic life.

The soul of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is that the

believers should practise their belief instead of discussing the theoretic teachings, and they should be real persons instead of becoming of religion. The reason that he was on the scroll of fame is just because he had brought forward the surprising theological thoughts in this book, such as “the world of age”,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and “participating God’s suffering and weakness” etc.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has gradually been thought much of, as i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ve ideas, and it has already been accepted as one of the one hundred best classic religion works in the 20th century. Being a responsible theology master for the world, Mr. Bonhoeffer who was hanged by Nazis only in his 39 years old, also had been awarded as one of the ten martyrs in the last century and was eponymous with the saint hero Martin Luther King.

《狱中书简》^① 是朋霍费尔在纳粹集中营中为世人留下的最后呐喊和历史见证。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神学家兼基督教牧师、世俗神学的重要发起人、著名的反法西斯英雄。1906年2月4日,他出生在布雷斯芬一个较有影响的大家庭里,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基督教传统文化的滋润和善良、正义、同情、博爱等基督情怀的濡染。朋霍费尔21岁时就以《神圣联盟》获得博士学位,25岁时就在赫赫有名的柏林大学担任系统神学的讲师。

^① 原书名为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本文根据中译本《狱中书简》(高师宁译,何光沪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撰写。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朋霍费尔一直奉行普世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然而，面对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的大肆屠杀以及国内主要教会对纳粹的依附，他又不得不采取非和平的方式去实现其“参与上帝的苦弱、为他人而存在、对世界负责”等基本信仰。为了更有效地抵抗希特勒的反动统治，朋霍费尔于1935年成立“自白教会”（又译“认信教会”）神学院^①，宗旨是以耶稣基督为终生追求的真理和日常行动的指南，拒绝国家对教会的统治和支配。他亲自担任该神学院的院长，并通过发表演讲和文章去激烈抨击纳粹的反动思想，积极投入地下抵抗纳粹暴行和暗杀希特勒的伟大运动，成为名噪一时的反对纳粹代言人。1940年9月，盖世太保发出命令，禁止他授课、传教、演说和出版等公开活动。1943年4月，朋霍费尔终因秘密援助14个犹太人逃往瑞士一事败露，遭到纳粹警察盖世太保的逮捕，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行动又一次失败后，盖世太保又搜查到了他直接参与的有关证据。1945年4月9日，年仅39岁的朋霍费尔被纳粹处以绞刑。

朋霍费尔思维敏锐、思想活跃，是一个十分多产的神学理论家。在其短暂的人生之旅中，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佳作。主要有《神圣联盟》（1927）、《行动与存在》（1931）、《创造与堕落》（1933）、《信徒的代价》（1937）、《共同的生活》（1938）、《伦理学》（1949）、《狱中书简》（1951）等。其中《狱中书简》和《信徒的代价》最近还被收进20世纪百部“最佳灵粮”宝库《宗教经典》之中。英年早逝的朋霍费尔作为上帝的见

^① 指1933年以来由德国部分新教神学家组织的独立教会，以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统治、抵制受纳粹控制的德国官方教会。参见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4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证者,也被英国伦敦威士敏斯教会列为20世纪十大殉道烈士之一,与圣雄马丁·路德·金等齐名。

在冰冷的单人囚牢中,朋霍费尔自始至终保持着一颗温暖的心。在《狱中书简》中,他详述了每天的生活、情感和思考;即使身陷囹圄也一刻没有停止对知识的追求,每天除了传道布教、帮助病囚外,还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他那惊人的安宁、自制,对他人的体贴、关怀,对自我和未来永不绝望的信念,深刻地表证着他始终分担着上帝苦弱的普世主义情怀……他正是由于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世界已经及龄”、“无神的神学”、“非宗教的基督教”以及“参与上帝的苦弱”等惊世骇俗的神学思想而名垂青史。《狱中书简》是他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断断续续写就的一些断简残篇,难以形成系统的、严谨的神学体系,有时甚至显得有点混乱和矛盾。然而,就是这些零星的思想火花构成了战后激进的“世俗基督教”和“上帝已死神学”的理论基础,点燃了20世纪世俗神学的熊熊火焰,引起人们对上帝已死和重视现世生活进行深入持久而又广泛的探究。

一、朋霍费尔的“宗教”观

朋霍费尔的所有神学思想都是建立在他对“宗教”的独到理解上。他认为“宗教”是人类幼稚时代的产物,与信仰虽有一定的联系,但不能将二者等量齐观。传统的“宗教意识”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表现了人类主体对形而上的虚幻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要表达个人的某种内在满足。在没有受到世俗化冲击的时代,这种“虔诚”和“内在”的“宗教”生活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二者既不符合圣经之道,也不适合现代形势发展的需要。

就第一层含义而言，他认为宗教主要是人对世界所做的一种形而上的解释。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一旦遇到人力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一种“全能、全知、全在”的“应急之物”或“意外救星”必然会应运而生。朋霍费尔称这种神为“机械之神”、“隙缝之神”或是被人们用来填补人类认识上一些缝隙的“塞孔之物”。在《狱中书简》中，朋霍费尔指出这种宗教观反映了人类未成熟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局限，只会使人在真实生活中逃避其应负的责任。然而，随着人类的及龄以及 20 世纪以来日趋泛化的世俗化进程，人类日益走上了自治、自律的道路，无论是道德、科学还是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是以人类的理性为标准，宗教的权威已被抛置一边，上帝的仲裁也无人问津，宗教已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而一去不复返。同时，朋霍费尔还进一步指出，这种宗教观事实上使得世界被切分为“神圣”与“世俗”两个部分。世俗世界的俗人只是在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才会到神圣的世界去寻求神，换句话说，一旦人们借着自己的能力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后，神就成了多余，并将被人们从这世界上放逐出境，从人类的公共生活中驱赶到最为隐秘、最为软弱的个人生活的范围内去，为精神病和心理治疗家利用人的宗教弱点去实现他们的诈取提供方便。

就第二层含义而言，朋霍费尔指出：那种认为人的主要本性是在于他内心深处那个最隐秘的背景，即其所谓“内在的生活”，而神现在就被安置在这秘密之处对人进行统治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他认为《圣经》并没有把人分割为内部和外部，而是关注人的整体。《圣经》里所言的“心”并不单指内在的生活，而且还包含着整个人与神的关系，它说明人的内外生活一样重要。因此，传统宗教把人的生活 and 世界划分为“神圣的”与“世俗的”两个部分后，只会使得整个人生和世界始终处在圣俗的争斗之

中。朋霍费尔强烈反对这种此世“圣俗相分”的观念。他说：教会一旦染有圣俗二分的观念，就容易关上大门、自筑壁垒而与外界隔绝；人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装得比神更虔敬，神通过“道成肉身”进驻在卑微的人群当中，目的是叫我们不能不以这个所谓的世俗世界为我们关注的对象。因此，朋霍费尔认为这种宗教观的结果显然是有违《圣经》初衷和有损基督之道的，并极力反对宗教化的基督教，主张“非宗教的基督教”。

朋霍费尔的“宗教”观深受世俗化理论大师卡尔·巴特的“区分上帝与宗教”和布尔特曼的“非神话化福音”等神学思想的启发，从而成功地把基督教的精神本质从传统宗教中剥离出来。1944年4月30日，朋霍费尔在他的狱中书信中写道：（今天）人能够通过词语，不论是神学语言还是虔诚的话语来了解每一件事的时代完结了，内心和良心的时代（这种时代应该说是宗教本身的时代）也完结了。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完全没有宗教的时代：现在的人们简直不再可能具有宗教气质。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应是对《圣经》中上帝“启示”的忠贞，摆脱“宗教”这种毫无生气的、抽象的、陈旧的信仰形式。他继续说道：我们整个有1900年悠久历史的基督教的传教和神学，依赖的正是人的“宗教性的前提”。……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这种先验的“前提”完全不存在了，而不过曾经是人类自我表达的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如果我们达到了彻底不要宗教的阶段，那对于“基督教”意味着什么呢？朋霍费尔认为，信仰乃是整个生命的行为，基督发出的召唤不是要人加入一种宗教，而是要人进入新的生命；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不在于他恪守守教形式，而是切切实实地在此世中做好人的本分工作；人应在刚强而非软弱时接近上帝，应在生命的勃发和荣显而非痛苦和死亡中吁请上帝；人应分担上帝在此世的苦弱而非强求他的全能。

朋霍费尔不是一个游心于观念之域的神学家，而是一位有深切现实感的神学家兼基督徒。他的“宗教”观明显是在激励基督徒自觉而主动地承担起对此世生活的责任，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证道，反对基督徒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纯精神性的属灵生活中，或一味地埋头于精致书斋里去讨论抽象而空洞的宗教神学。朋霍费尔这样说了，更这样做了。不仅他的“宗教”观被神学家们普遍赞誉为“有特色、有创见的神学”，而且他本人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对世界负责的神学大师”。

二、世界已经及龄

朋霍费尔的“宗教”观乃是基于他对“世界已经及龄”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宗教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人类已经走出了只有依赖宗教才能生存的幼稚的童年时代，也就是说人类世界已经成年了。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及龄的世界业已达到某种自觉的阶段，人类初步认清了自己生存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并且学会了通过自己的理性去对付所有重要的问题，而不再虔诚地去求助于一个起作用的假设的“上帝”，在这一过程中“上帝”越来越被排挤出人类生活的世界。在《狱中书简》中，朋霍费尔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这个及龄世界的演变过程，并对反对这一观点的护教学家予以有力的回击。

1944年6月8日，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他的立场：大约从13世纪起，人类就开始了这场走向自律的运动。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场自律运动已达到某种完成。……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能够解决各种重要的问题。在宗教问题上也是如此：事情正在变得很明显，每样东西没有“上帝”也行，而且同以前一样好。同在科学领域一样，在

一般的人类事务当中,我们称为“上帝”的东西正越来越被挤出生活,越来越失去地盘。有1944年7月16日的书信里,他又从神学、伦理学、政治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等方面描述及龄世界的主要特征,肯定人和世界的自律观其实就是在理智与诚实的名义下,抛弃或省掉那些曾起作用的假设的上帝。

一些拒绝世界长大、欲把人类拉回童年时代的基督教护教论者,曾对“世界已经及龄”的自信和自觉精神进行攻击。他们辩解道:人没有神的庇护是不能生存的。纵使一切俗世的问题都能自行解决,但是对于诸如罪恶与死亡(只有靠神的“救赎”和“复活”才能供给终极意义)等根本问题,凭借理性和自信是无法解决的,这就是人需要有神、教会和牧师的最根本原因。甚至一些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和精神病治疗家,为了尽量使人感觉到内在的失望,也不时地随声附和道:所有人在本质上都是不快乐的,并且常常处在绝望之中,只是人们不肯主动承认罢了。

针对这些论调,朋霍费尔在1944年7月16日的书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成年,迫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我们与上帝面对面的处境。上帝实际上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作为没有他也能过得很好的人而生活。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离弃我们的上帝(《马可福音》15:34)。让我们在这世界上不用他作为起作用的假设而生活的那位上帝,就是我们永远站在他面前的那位上帝。朋霍费尔继续反驳道:上帝容许他自己被推出这个世界,被推上十字架,充分证明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软弱无力,而且再也无法给人类提供庇护。《马太福音》第8章第17节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上帝不是靠他的全能,而是靠他的软弱和受难帮助我们,为人类现实的一切苦难提供终极意义。最后,在1944年6月8日的书信中,他还批评那些基督教护教学家对“世界已经及龄”所作的抨击,首先是不得要领的,其次是卑贱的,第三是

非基督教的。之所以称它不得要领，是因为护教论者企图把一个成年人再拉回到少年时代去，勉强他去依赖一些事实上他不再需要依赖的东西，把他推回到一些他认为不再是问题的问题之中去。之所以称它卑贱，是因为它等于是为了一些人们所不知的目的而企图利用人的弱点，这些目的并非出于人们自愿的选择。因为他们要如此做就得尽量揭发一个人的弱点，为了那人所不了解的目的这样做，而非出于他的自愿。之所以称它是非基督教的是因为基督本人被换成了人类宗教性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人间律法。

值得注意的是，朋霍费尔绝没有贬损或诅咒上帝的意思。在1944年7月8日的书信中，他明确地说：不应把上帝逐到某种最后的隐秘地方去，相反，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世界和人类已经成年，我们不应该贬损人的世俗性，而应让人在其强有力之处去面对上帝，我们应该放弃我们所有的教士式的遁辞，以及把精神疗法和生存主义视为上帝之先锋的想法。……上帝之道是远离这种不信的反叛，这种来自下层的反叛。它是君临一切的。在1944年4月30日的书信中，他希望我们在谈论上帝和教会时，不要在生活的边缘，而要在生活的中心；不在软弱中，而要在力量中，因而也就不在人的苦难和死亡里，而就在人的生命和成功里来谈论上帝。在边缘上最好是保持我们的平静，丢开那个未解决的问题。相信复活并不是解决死亡问题的方法。上帝的那个“彼岸”，并不是我们的感知能力的彼岸。以感知为基础的理论的超越，与上帝的超越毫无关系。上帝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彼岸”。教会并不是站在人的力量用完耗尽的地方，不是站在边缘上，而是站在村子的中心。

总之，世界的成年已不再是神学论和护教论的机会或论题，但是它确实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就是说，是在福音的基础上来理

解,是在基督之光当中来理解。作为一个基督徒,其“世界已经及龄”的主旨是反对把“上帝”或者说把一种具有神圣、终极意义的关切,仅仅局限在个人的、内在的、私生活的领域。朋霍费尔认为人不能放弃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并要求人们优先关切那些社会政治领域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三、非宗教的基督教

通过对“世界已经及龄”、“人类正在走向一个完全没有宗教的时代”等独到的论述后,朋霍费尔自然地提出了“非宗教的基督教”观点。在1944年4月30日的书信中,他说:不断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是,今天,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基督教,甚至什么是基督?基督教整个1900多年的传教和神学史依赖的正是“所有人都是宗教性的”这一大前提。我们所称为基督教的东西一直都是“宗教”的一种模式。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这种先验的“前提”完全不存在了,而不过曾经是人类自我表达的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如果我们达到了彻底不要宗教的阶段,那对于基督教意味着什么呢?

面对世俗化的强大冲击,基督教护教神学家毫不例外地都是把这种先验性的“前提”,作为基督徒与人交流的天然的切入点,作为固守基督教的最后一道防线。在1944年6月8日的书信中,朋霍费尔特别以蒂里希为例,他说:蒂里希根据人人心存死亡与得救的忧虑即终极关怀的问题,提出了“人是有宗教性的”假设。然后,蒂里希就着手用宗教意识来解释世界本身的进化(朋霍费尔觉得这是与世界自身的意志相违的进化),以便通过宗教赋予世界一个完整的形态。朋霍费尔认为蒂里希这样做倒是十分勇敢,但是这个世界根本不买他的账,继续按照自己的意志前

进。朋霍费尔最后又补充解释道：当然，这个世界的确需要有人去更好地了解它，比它自己对自身的了解更清楚，但并不像一般宗教社会学家所希望的那样，一定非得从宗教的方面去理解不可。世界已经及龄，人们简直不再可能具有宗教气质，而基督教也进入了一个非宗教的时代，无须借助宗教的支撑。在1944年4月30日的书信中，他曾说过：如果我们最终不得不把基督教的这种西方模式看做仅仅是完全无宗教状况的预备阶段的话，对我们、对教会来说，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基督如何能够成为甚至是那些毫无宗教的人的主呢？如果宗教只是基督教的外衣，那么，什么是非宗教的基督教呢？

朋霍费尔指出：巴特是发觉护教神学家这些错误观点的第一个人，他也是惟一个沿着“非宗教的基督教”这条思路去思考的基督教神学家。因为巴特曾经批评这些护教神学家无意中全速航行在自由主义神学的航道上，指责他们所有努力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在世界之中或在世界对面为宗教清扫出一片空地来。朋霍费尔称赞巴特把耶稣基督的上帝列入反对宗教的行列，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还仍然是他最伟大的贡献之处。但是朋霍费尔也指出了巴特思想的局限性：他在对神学概念的非宗教性解释方面，的确没有给出任何教义学或伦理学的具体指导。同时，朋霍费尔还分析了布尔特曼的神学观：布尔特曼虽已感觉到巴特的局限，但他却从自由主义神学角度对之作了解释，并由此陷入了自由主义的化约过程，即抛却了基督教的“神话”因素，把基督教简化得只剩下了“本质”。朋霍费尔反对这种极端化方式，认为神话概念是完整基督教内容的一部分，应予保留。他认为，在一个没有宗教的世界里，没有宗教就是指没有形而上学和灵性等在时间中受到影响的前提条件，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去谈论上帝，而只能以世俗的方式来谈论；教会和基督徒不再认为自己在

宗教上特别得宠或“蒙召”，而只能认为自己完全属于这个世界的一分子；基督也不再是一个宗教的对象，而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了，事实上确实是这个世界的主了；崇拜和祈祷也就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了。

在1944年7月16日的书信中，朋霍费尔指出了基督教与一切宗教之间的决定性区别在于：面对已成年的人类，基督教的上帝教导他的信徒，必须作为没有他也能过得很好的人而生活，也就是说，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离弃我们的上帝（《马可福音》15：34）；上帝之所以能帮助人类，不是因为他的全能，而是靠他的软弱和受难（《马太福音》8：17）。他是一个真实的上帝，既没有宗教性，也不是人类的“意外救星”。人类成熟的过程就是放弃那种虚假的、宗教性的上帝概念的过程。人类最终会还《圣经》中所描绘的上帝的真面目。在7月18日的书信中，他还对宗教与基督教信仰作了一些区别：宗教总是虚伪的、禁欲主义的、部分行动的事情。而基督教信仰乃是参与上帝的苦难，即必须过一种此世的生活。信仰总是整体的事情，是包含整个生命的行动。

在1944年7月21日的书信中，朋霍费尔对怎样在非宗教的基督教世界里做好一个基督徒，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大约在去年，我开始前所未有地赏析起基督教的“此世性”来了。基督徒不是宗教性的人，而是一个纯粹的、单纯的人，正如道成肉身的基督和施洗约翰一样是生活在这个世俗世界上的人。……只有通过完全彻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才能学会信仰。人必须放弃每一种要把自身造就为某种人物的企图，不论是一位圣徒，还是一个皈依的罪人，不论是一位教会人士，还是一个正直或不正直的人，抑或一个生病的人或健康的人。所谓的“世俗性”指的是：以自己的步伐去接受生活，连同生活的一切责任与难题、成功与失败、种种经验与孤立无援。正是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我们才完全投

入了上帝的怀抱,参与了他在此世的受难,并在客西马尼园与基督一起警醒守望。这就是信仰,这就是皈依,这就是造就一个人和一个基督徒的东西。如果我们通过此世生活而参与上帝的受难,成功怎么能使我们狂妄自大,失败又怎么能使我们迷失道路呢?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朋霍费尔为基督教所进行的“非宗教”的所有诠释,其真实用意是要把基督教从世俗化的冲击下、从人们日益唾骂的宗教中解放出来。在新的形势下,去掉基督教所谓“宗教体制”而保留其精神本质,并使这种精神渗入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朋霍费尔与马丁·路德当年宗教改革的用意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①。他强调基督教会和信徒应当彻底进入火热的世俗社会去分担上帝的苦弱。他对其他护教者的诚挚批评,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他为基督教的生存和更好的发展而用心良苦,其实他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基督教护教学家。

四、参与上帝的苦弱

从理论教义回到信仰实践,从“宗教性”的人回到单纯的人乃是朋霍费尔所有神学理论的归旨和思想精髓。他曾多次强调:基督信仰乃是整个生命的行为;基督发出的召唤不是要人加入一种宗教,而是要人进入一种新的生命;一个人能否成为基督徒,不在于他是否恪守“宗教”形式,而在于他是否是切切实实地做一个现实的人,是否在今生此世的生活积极参与上帝的苦弱。

朋霍费尔之所以强调信仰的实践性乃是基于当时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方面,由于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信仰和神学界已经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始出现了两种不利于基督教发展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当时的新正统主义神学越来越与《圣经》中的平民精神相背离,陷入了一种拘泥于教义阐释却永远给不出答案的困境之中。第二种情况是“内里生命奥秘派”神学盛行于整个西方信仰界,它使得许多信徒为了达到“内里生命”的成熟,而完全沉湎于个人的灵修,使信仰几乎失去了影响世俗生活的能力,落到了一种自我封闭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鉴于当时欧洲社会的专制与极权正在膨胀,现实情况已经到了非常黯淡、混乱的地步。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责任、肩负神圣使命的神学家,朋霍费尔及时地意识到了这两种倾向对他所向往的社会所造成的巨大消极作用,所以他不得不奔走呼号于信徒之间,希望他们勇于承担现实的责任,在实际生活中践行十字架上的真理——分担上帝的苦弱。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认为在本该呐喊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无异于也间接地参与了罪恶。

朋霍费尔之所以认为一个威严而又全能的上帝已变成了一个苦弱而又遭遗弃的上帝,是由于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的。从历史情况来看,一方面,《旧约》里的神是威严而不可亲近的,因为他显现在人类面前的是公义的面貌,而公义是我们这些罪人的天敌。到了《新约》,神确立“道成肉身”的原则,神以他对人类的挚爱,使其独生子以苦弱而又遭遗弃的形象,走上十字架去为人赎罪,平息人与神之间的罪债。这次伟大的十字架事件是神对人类的重价的恩典。^① 另一方面,“苦难神学”本身也并不

^① 在《信徒的代价》一书中,朋霍费尔称“廉价的恩典”是宣扬不需悔改的赦免,有洗礼的仪式而无教会的纪律,领圣餐而不需认罪,宣告罪得赦免却缺少了个人认罪。廉价的恩典是不付上门徒代价的恩典。“重价的恩典”是上帝为了我们的生命,以自己独生子在十字架上受难为代价而换取的。它使罪人得以称义,是上帝道成肉身的真谛。重价的恩典是需要不断寻找的福音、是必须祈求才得着的礼物,是必须叩响才打开的门。为了追求这种恩典,人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变卖一切。

是什么“新”的神学。早在1518年，马丁·路德在阐述“因信称义”的十字架神学的时候就曾指出：十字架上的上帝不是通过力量和荣耀来将自己彰显，而是在苦难和十字架上显示给人，使罪人能够得以“因信称义”。从现实情况来看，20世纪特别残酷的历史现实，迫使神学家们对“上帝与苦难”的问题给予过多的关注。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给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曾经持有的深信不疑的乐观信念无异于当头一棒；另一方面，现实的“苦难”也对相信至善至爱而又全能的上帝观的基督教信仰和神学产生了很大的挑战与冲击。其实，当时的世界，朋霍费尔认为已经是“一个不信神的世界”。朋霍费尔正是在这一严酷的现实情况下，从时代的处境和负责任的神学出发，对保守的传统神学和宗教观念进行否定，并力图创立一种适应世俗社会的新神学。从世俗生活的观点上来看，这个基督完全是一个失败者形象、遭人蔑视的形象：与《圣经》记载不符。《路加福音》24：40—43有一个强盗是信基督的；另外说门徒“离弃”也不是事实。朋霍费尔还明确指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的宗教意识使人在痛苦时才去仰赖世上有力的神，以神为救星。而《圣经》则指引人去寻找一个无能为力和为此世经受着痛苦的上帝。这个上帝是超验的、绝对自在和绝对无辜的，但他在十字架上受难牺牲却是上帝神性的显现，是上帝给人类的重价恩典，是基督信仰的基本体认。因为，上帝的苦弱是为了表明上帝最痛心于人的苦弱，并以自己的挚爱来分担人的苦弱。这种主动的苦弱与挚爱的行为表明了上帝认同人的苦弱，并给人类现实的苦弱提供终极的意义。这样的上帝才是离我们更近、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同时，上帝此世的苦弱还让人确信：最终的胜利不会是苦难、不幸和死亡，而是和平、正义和爱，耶稣基督的上帝最终会把人从罪恶、苦难和死亡中解救出

来, 把人类引向终极的正义、彻底的和平和永生的上帝。

那么, 我们应该怎样参与上帝此世的苦弱呢? 在1944年8月3日的书信中, 朋霍费尔认为, 信徒首先要明白的不是对上帝全能等的抽象信仰, 因为那不是对上帝的真正体验, 而是对世界的局部延伸。真正的信仰就是参与耶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上受难与复活等实在的东西。我们同上帝的关系, 不是同一个在力量与仁慈方面都是绝对的最高存在物 (那是关于超越的虚假概念) 的宗教关系, 而是一种通过参与上帝之存在, 为着他人而活的新生活。朋霍费尔还认为, 真正追随耶稣的基督徒就应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基督, 认同、参与基督的受苦和遭蔑视, 把生命完全交给以十字架上的大爱与一人一同受苦的上帝手中, 参与十字架的苦难, 对此世的暴虐和不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认为, 袖手旁观是最不合乎基督之道的。基督徒是历史之主的器皿, 要以“基督自由地、孤独地、以一个无罪的人而默默无闻地、身心双重地受苦”作为榜样, 以负责任的行动, 抓紧“时机”, 去面对一切危机, 把基督怜悯之心和救赎之爱付诸在切实的行动中。同时, 朋霍费尔还指出: 强调现世的行动, 绝非指那些安逸、随便、忙碌、事事无谓的流俗的俗世主义, 而是要对生命负责、对世界负责, 最终对上帝的痛苦负责的现世态度。它意味着, 由于上帝的缺席, 人的责任更为重大。在践行基督之道时, 朋霍费尔还告诫信徒要避免恐惧和愚蠢。恐惧是人的一种阴暗面, 是一种应该隐藏起来的東西。而愚蠢是一种道德的缺陷。惟其愚蠢, 人才会自以为是。

在一个上帝已经隐退、一个最缺乏责任、并以不同的理由普遍推卸责任和嘲笑责任的时代, 朋霍费尔呼吁所有人, 特别是基督徒, 只有参与上帝的苦弱、承担现世的责任, 才是人的悔改的完成和免除“不义”的惟一出路。在当今世界之中, 人负起生命

的责任和艰难，就表明人已站在上帝面前，体认到上帝在此世的软弱，这也就是信仰。基督受难的目的是为了启示教会或后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朋霍费尔认为，真正基督徒的意义就在于：不仅仅要在观念上认信十字架上的真理，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上践行十字架上的真理；不仅仅要在观念上认信十字架上的基督，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跟随基督。基督徒之所以称为基督徒，正在于他们“必须”分担主的苦弱。他曾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基督徒和教会应该怎样在此世生活中，积极地践行自己的责任。他说，如果有一个疯子开着车在到处轧人，那么，信徒的职责就不仅仅是埋葬死者、安慰受害之人，更重要的是要冲上去制服这个疯子、阻止他的暴行。20世纪的灾难就可以看做人类因逃避责任而被迫承受的一次漫长的服役过程。

1945年4月8日（即临刑前一天的那个星期天），朋霍费尔牧师给囚友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礼拜仪式，刚刚做完最后的祈祷就被两个面带凶相身着便衣的人带走了。大家都明白这将意味着什么，并走过去向他诀别。年仅39岁的朋霍费尔却坦然地说道：“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① 赴义时的从容业已表明：他不仅学会了死的艺术，而且还战胜了死亡。他在《狱中书简》就曾说道：死亡是自由之路上最盛大的节日。他知道，他的真实生命是在永恒的上帝那里。

朋霍费尔离我们而去虽有50多年了，但他还仍然在用他的书向世人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展现他那深邃而又有远见的神学思考。他的生与死已成为20世纪苦难历史中基督教精神的光辉见证。《狱中书简》也成了基督徒漫漫征途上的一盏指路明灯。

^① [德]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何光沪校，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